

面向未来要活下去的人，也必须面向过去活着。

我

有个
与历史

约

会

入江昭

治史心得

【日】

入江昭（Akira Iriye）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我
与
历
史
有
个
约
会

人江昭 治史心得

「日」人江昭 (AKIRA ICHIYOSHI) 著
杨博雅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11-8187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与历史有个约会: 入江昭治史心得 / (日) 入江昭 (Akira Iriye) 著;
杨博雅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3

ISBN 978-7-301-22235-5

I. ①我 … II. ①入 … ②杨 … III. ①史学 - 研究方法 IV. ① K0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038115 号

《REKISHI O MANABU TO IU KOTO》

© Akira Iriye 2005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KODANSHA LTD.

Publication rights for 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 edition arranged with KODANSHA LTD. through KODANSHA BEIJING CULTURE LTD. Beijing, China.

本书由日本讲谈社授权北京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简体中文版, 版权所有, 未经书面同意, 不得以任何方式作全面或局部翻印、仿制或转载。

书 名: 我与历史有个约会: 入江昭治史心得

著作责任者: [日] 入江昭 著 杨博雅 译

责任编辑: 张善鹏

封面设计: CINEBOOK · 翁华晖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22235-5/K · 0947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新浪官方微博:@ 北京大学出版社

电子信箱: zpup@pup.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0112
出版部 62754962

印 刷 者: 三河市北燕印装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A5 5.5 印张 100 千字

2013 年 3 月第 1 版 2013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18.00 元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信箱: fd@pup.pku.edu.cn

中译本序

七年前（2005年）用日文撰写的这本书，这次能在中国出版，真是一个出人意料的惊喜，我深感荣幸。首先应该感谢从中文的出版策划到翻译发行给予大力支持的北大培文公司总经理高秀芹女士、不辞辛苦的编辑张善鹏先生的鼎立协助，以及全面负责协调和翻译的杨博雅先生。

我的著作在中国出版了三册，如果能以翻译出版这种形式加强中国和日本、中国和我长年工作的美国之间的知性文化联结的话，我也会感到格外高兴。

我深信，人与人之间超越了国界的关系，是现代世界中值得关注的现象之一。这种关系的进一步加深，对今后人类相互和平共处是不可缺少的。我一直在想：作为人们之间超国界关系的一部分，能否使更多的人以同样的视点回顾过去，即共享历史呢？本书即是这方面的一种尝试性记录。

我们这一代，即1930年代出生成长的一代，现在已经步入了七十岁到八十岁的高龄。这代人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正在充满不确定性的现代世界度过余生。对于开创21世纪的一代，

特别是年青一代，我们有义务把我们所生活过的时代的历史传承给他们。因此，本书也是世代之间的一种对话尝试。生长在全球化时代世界各地的年青一代和各国的高龄世代之间，如果没有可以共享的历史，那将是一个很大的悲剧。历史孕育年青一代，同时，年青一代创造历史。在这样一代又一代不断转变的世界中，该如何去理解人类的过往？人类是怎样变化来的？今后世界又会走向何方？为了思考这些问题，也需要超越国界和世代的知性联结。

正如本书中所提到的，我和历史的接触是在1945年，可以追溯到日本战败。长时间的战争及战败经验所带来的，是以开放的心态正视历史，这一点尤为重要！在那之前，我们这一代人对历史了解得是何等之少！某种程度上说，战败，也是从无知中的解放。之后，我学习历史，然后把学到的知识尽可能地传授给更多的人，并与不同的人交换意见。作为一个历史学者所写和所讲的，从根本来说都是自己理解的过去，这些到底能为多少世界上的人们所共享呢？我一直尽可能地回避个人独见，期望论述和传承历史，而这无论是对历史专家来说，还是对各国“有修养的读者”来说，都是有意义的。

这本拙著能否实现上述目标，还有待读者判定。不过，如果多多少少能够得到读者认同的话，作为笔者来说，便已深感至高无上的喜悦了。

2012年5月
入江昭于美国

目 录

中译本序 3

| 第一部分 | 与历史相遇 1

一 1945年8月	3
二 1930年代与战争年代中的经历	7
三 战后的历史教育	11
四 留美四年	19
五 在研究生院的学习	38
六 与学生的相遇	49
七 历史学者的世界	67

| 第二部分 | 历史研究的轨迹 79

一 相遇积累的历史	81
二 我的历史研究	85

第三部分 过去与现在的关系	117
一 学问与政治	119
二 隐藏在历史认识问题根底的东西	128
三 地区共同体的去向	138
四 “9·11”后世界发生变化了吗？	146
五 结论：文明之间的对话	155
附 录 学习历史的参考书	160
后 记	168

第一部分

与历史相遇

|一| 1945年8月

十岁时迎来的战败

昨晚和祖父、父亲等说好要散步，早上自然地就醒来了，马上洗了脸，跟祖父、父亲、妹妹我们四个人一起去散步。

（摘自我的日记）

1945年8月19日，我开始写日记。在那之后也曾有过中断，但是，基本上六十年来每天都在写，而最早的日记开头就是这句话。战争刚刚结束四天，仅从日记的这一开头〔片段〕就可判断，里面记述的都是极为平凡的生活。当时，我上小学（那时叫国民学校）五年级，7月31日刚从疏散的长野县返回东京不久。我是1934年10月出生，1945年8月才十岁。虽说日记中记的仅仅是日常生活和在校学习的东西，但时过六十年后的今天再读一下，可以看出当

时自己是想要去理解社会和世界的。

一个十岁孩子对战争、战败是怎么认识的呢？现在回想起战争结束后自己的记忆，才知道战败使自己的思维方式，说得极端点连世界观都完全改变了。不过那时候，自己并没有那么切身体会到世界突然发生了变化。

但我的确清楚地记得：祖母在听到8月15日的“玉音广播”（昭和天皇亲自在广播里演讲，宣布无条件投降）时说：“已经受够战争了”，“以后再也不会有灯火管制了”，一家人很是高兴，而自己当时的心情和想法含含糊糊的地方还是很多。美国小说家华莱士·斯特格内曾说：“所谓的回忆，几乎一半都只不过是虚构的。”重读我的日记，正是这种感觉。

例如，当时的日记里出现最多的不是“战败”和“占领”，而是食物。几乎每天都是一样：吃了什么、紧缺的食物是如何发放的、为了补充那些食物又是到何处去采购的等，都被详细记了下来，可以看出当时对日本人来说，如何确保每天吃到食物是个切身的问题。

我们家住在东京杉并区，没有被空袭烧毁。但是新宿（当时的淀桥区西大久保）附近祖父母的家，却在3月10日的大空袭中被烧毁了，就这样祖父母也搬到了我们家一起来住。日记中记载着：与身体虚弱的母亲相比，健康的祖母和我每周都要出去采购食物。

涂抹的课本

对原本是典型军国少年的我来说，那可能是一种屈辱。但我 1945 年的日记里几乎没有提及美国和占领军。例外的是 8 月 28 日的日记中写道：“今天是联合国军队进驻之日，美国的飞机悠然地超低空飞去，很窝心，但又万般无奈，只有学习。”“只有学习”的意思是什么都不能做只有在家学习？还是拼命学习争口气将来给美国看？说不清，我的日记详细记有每天学习的情况，由此判断可能是前者的意思吧。憎恨美占军的记忆和记录都是没有的。我想应该是像大多数日本人那样，无论是好是坏，还是接受战败，每天努力地去生活。

占领军下达命令，删除了学校课本中有“军国主义色彩”的部分，或被黑墨涂抹掉，这是我们这代人记得最清的一件事。我的日记中唯一提及此事是在 1946 年 3 月 26 日，“因日本战败，遗憾的是从国语中删除了有关战争的部分”。如果“涂抹”课本对我是最大打击的话，应该会有更详细的记述。这也是记忆和“虚构”混合在一起的例子。

尽管如此，在回想作为历史学者的我的心理个性时，这种“用墨涂抹”还是成了出发点。不过，当时历史和自己结合到何种程度，仅通过日记来看，还是不能确定的。1946 年 4 月我已经是六年级

了，班里成立了几个小组，开始了课外学习。我的第一志愿是数学组，“第二志愿经反复考虑选了地理历史组”。那时，我对学历史还没有特别的亲近感。

仅仅是从主观角度去看十岁时经历的战败这样的大事件，和那时学的历史被涂抹改写这两件事，在我和历史的相遇中起了决定性作用。从日记中可以看出，当时我并没有真正感觉到这两件事对我日后成为历史学者起到决定性作用。而与此同时，在之后六十年里，也可以说我的历史观与我对“8·15”的理解和记忆是密不可分的。对此需要[向大家]做一些说明，[下面]我将首先简要地叙述一下1930年代我的成长史。

|二| 1930年代与战争年代中的经历

进入国民学校

昭和元年（1926年）到九年（1934年）出生的人被称为“昭和个位数时代的人”，我是接近那个世代的末尾。小学1941年改名国民学校，我正上一年级，在离家不远的大久保国民学校上学。

准确来讲，“家”指的是祖父母家，父母和我、妹妹四个人起初住在丰岛区，后来搬到了杉并区。我出生在池袋护国寺附近，不久父母从著名的阿依努语言研究者金田一京助博士手上，买到了杉并区成宗一所独门独院的房子，一家人便搬了进去。（记得父亲多次说过，这所房子的出售广告里称：“坐下来便可眺望富士山”。由此可见，当时的杉并区与其说是城里，不如说是郊外。）

当时，在同盟通信社当记者的父亲（入江启四郎），1937年到日内瓦分局赴任，次年调任巴黎分局，同年母亲渡法，留在东京的

我和妹妹由西大久保的祖父母来抚养。祖父（塚本哲三）是补习学校的国语兼汉文老师。我记得，上一年级时，父母还在法国，祖母拉着我的手去上学（在时隔五十年后的1990年代，我与那时在教室坐并排桌子的同学又见面了）。

一年级那一年（1941年）的12月，日本海军偷袭了珍珠港，太平洋战争（当时叫大东亚战争）爆发，但我对这几乎没有记忆。这年6月，父亲被调回同盟通信社东京总社工作，我和父亲相隔四年后重逢，和母亲则是相隔三年，四至七岁的儿童时代没有和父母一起生活对我造成的影响，只能靠推测了。

不久，父亲又调往南京分局，直到1945年5月几乎都在中国；我们兄妹不能说是父母抚养的，幼年少年时代受祖父母的影响倒是不可估量。就我来说，幸运的是，从小跟祖父学习了汉字，而且，热爱相扑的祖父还常常带我到国技馆。有一点可能是他没想到的，那些大力士的名字，让我对复杂的汉字产生了亲近感（直到已经在美利坚生活了五十多年的今天，每次回到日本我都要尽情观赏相扑）。

在大久保国民学校三年学习的是“读，写，算数”的基础，没有学习历史和地理的记忆。父亲有时从南京回国，但没有和父亲谈过历史和时事问题。在我什么都不知道的情况下，战况日渐吃紧，物资开始匮乏。住在市中心感觉危险，因此，1944年4月我们家又搬回以前住过的杉并区成宗，我也转学到杉并第二国民学校。

这所学校的国粹主义氛围要比大久保国民学校更加浓厚，每天早会都要在操场上列队，宣誓的开头是：“我们是天皇陛下的孩子”。

学童疏散

新学期刚刚开始，政府为了防备空袭，发表了疏散学童的方针，我也在 1944 年 9 月被集体疏散到长野县的真田。不到十岁的我被迫离开家，开始了和同学们大约十个人住一间屋子的杂居生活。那里的自然环境很好，但我却未能去尽情欣赏那些。租借附近学校教室开的课也不怎么正规。我们在那里基本上没怎么学习，整天都是到外“义务劳动”。为了多平整些耕地拔拔桑树根，为了方便渡河往附近小河里扔石子，这些看上去都是些很容易的事，可是由于食物短缺，对吃不饱肚子的儿童来说，都是很艰巨的工作。我的体重也在不断减少，加上缺钙，出现了类似皮肤病的症状。

碰巧，1945 年初夏，从中国回国的父母一起来到了我们的疏散地，看到我和妹妹虚弱得连嘴都张不开，就将我们领回了东京。时值 7 月 31 日，战争虽还没有结束，但在当时那种情况下，大人和孩子别居毫无意义，还不如东京成为一片“焦土”时一家四口死在一起好了。这也是父母当时作出的一大决定。

随着战况恶化，美军攻占马尼拉、冲绳军队全部被歼等消息也传到了我们的疏散地。就是这样，老师们仍在极力提倡斗志，训练我们使用“竹枪”。用竹枪迎击登陆的敌人，对当时只有十或十一岁的疏散儿童来说，完全是种毫无意义的战术，但是除此之外也没有其他办法。老师每天都讲，日本是“神之国”，不会战败的，我们也是囫囵吞枣地就那么信了。似乎是为了使这种信念正当化，我们每天还要背从神武天皇开始的“万世一系”谱系。当时，我们这一代人的历史观也就是这种程度。